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唐飞,王定坤.大规模环境损害区分救济比较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6(4):82-87.

# 大规模环境损害区分救济比较研究

唐飞 王定坤

(长江大学 法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在大规模环境损害中,生态环境的破坏涵盖国家、私人以及公共利益等多重利益损害。细分不同的权益主体,确定各自的索赔依据,能够实现对生态环境损害的充分救济。可以通过立法确定国家机关索赔处于优先顺位,只有在国家机关怠于行使索赔权的情形下,才由社会组织主张赔偿。将自然资源损失导致的经营收益和生计损失确定为普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益,自然人可以就此提出赔偿。

**关键词:**大规模环境损害;生态损害;民事权利;区分救济

**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3)04-0082-06

大规模环境损害也称为“大规模环境侵权”(mass environmental torts),属于大规模侵权的类型,具体表现为大量个人因环境污染受到财产或人身权利的损害。大规模侵权通常是由企业或个人的行为造成的,包括产品责任、医疗事故、环境污染等。大规模侵权制度旨在救济因同一事故或者侵权事件而受到损害的多数受害人。

在应对大规模环境损害事件中,我国立法和司法历经了从无到有、日趋合理的演进过程。早期,由于缺乏立法依据,司法救济孱弱,救济不力。在一些大型的生态环境污染案件中,司法介入严重滞后,甚至缺失,影响了救济效果。如渤海蓬莱溢油案件,康菲公司钻井平台发生大规模溢油事故,造成污染海域内大量海洋生物和养殖鱼类死亡,多数法院对于该案件不予立案。海洋生物和渔业资源的利益主体具有多元性,海洋生物和渔业资源既属于国家自然资源,也是渔民养殖户等民事主体的经济来源。如何确定适格的索赔主体,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该纠纷的解决主要依靠行政干预,最后由农业部和损

害方康菲公司及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康菲公司支付 10 亿元,用以补偿污染区域的天然渔业资源和养殖生物。<sup>[1]</sup>政府主导下的一揽子赔偿计划,既包括生态环境的损害修复,也包括自然人主体的财产权利损失赔偿,救济对象在法律权属性质上存在较大差异,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赔偿类型的混淆,在以诉由为基础,强调分类救济的司法诉讼中,必然影响案件的受理。而行政干预救济重在补偿结果,程序性障碍较少,因此,类似大规模环境损害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解决矛盾纠纷。随着此类事件的不断发生,我国开始重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立法和司法,逐步出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制案件的受案和审理。

大规模生态环境损害中,私益和公益的侵害呈现出交织的状态。生态环境是环境权利的客体,具有公共利益属性。<sup>[2]</sup>而作为生态环境构成要素的自然资源,可以表现为特定自然人主体的财产权益,具有私益性。在此类生态环境损害中,合理确定索赔主体,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有利于充分保护生态

收稿日期:2023-01-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大规模环境损害下民事权利救济机制研究”(17YJA8220084)

第一作者简介:唐飞(1974—),男,湖北荆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商法、环境法研究。

环境,维护民事主体的人身财产权利;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双重赔偿,以合理确定赔偿主体的赔偿责任。我国立法在演进过程中部分借鉴了外国的立法经验。发达国家关于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立法,较为典型的模式是分别赋予国家机关和普通民事主体救济权利,针对生态环境损害中损害的不同对象和范围进行索赔和求偿,无论是对环境本身损害的修复,还是对普通民事主体的人身财产权利救济,均有积极影响。作为法律索赔主体,国家机关和自然人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在索赔上形成了不同的权利基础,可以针对不同生态环境损害客体提起补偿。

## 一、域外国家机构对纯生态损害的索赔权利

### (一)生态环境损害求偿的权利基础

生态环境资源损害求偿主体的确定,以受害的环境自然资源权利的划分及权利的归属为基础。综观各国立法例,一般授予国家及其政府为自然资源索赔人的资格。但是,各国对于国家行使求偿权权利基础的认定存在差异。

对于自然资源的损害,美国采取的是受托人制。美国相关法律赋予政府作为自然资源受托人的资格,当自然资源受到损害时,由政府作为受托人,代为起诉。如美国的《油污法 1990》(OPA1990)1006 条 b 款第一项一般性规定:“总统或者有权代表公众、印第安部族或外国的任何州政府、印第安部族管理者及外国政府,可以作为受托人就自然资源的损害赔偿提起诉讼。”该款还规定:“总统应指定能代表公众利益的联邦机构,作为自然资源受托人;州政府应当指定能代表公众利益的州或地方政府机构,作为自然资源受托人,并将指定事项报知总统。”Deborah G. Musiker 认为,美国自然资源损害的受托人模式,源于普通法上的国家监护权所产生的公益信托原则。<sup>[3]</sup>根据该原则,联邦政府或州政府是为公共利益保存或持有自然资源,该资源属于公众。国家监护权原指国家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后用于解释国家对公众所有的河流和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进行监护。政府受托人制的理论基础源于公共信托原则(public trust doctrine)。根据公共信托理论,某些自然资源由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托管,因此,公众对这些资源拥有固有的和永恒的权利,而国家权力对这些权利予以妥协并实施保护。解释公共信托原则,最好的方法是类比普通信托法。

在普通信托安排中,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法定所有权,并负责管理信托财产。信托受益人有权从信托财产的管理中获得信托利益。受托人拥有管理信托财产的广泛权力,但必须始终以所有受益人的利益行事,并且必须在管理信托财产时采取合理谨慎的态度。<sup>[4]</sup>类比于公共信托原则,受托人是国家,信托财产或资源是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每一种自然资源,受益人是公众。因此,与普通信托类似,根据公共信托原则,国家(受托人)有义务为了公众的利益维护公共信托(自然资源)。公共信托原则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查士丁尼《法学阶梯》建立了公共信托学说的基础,其中规定:“根据自然法则,人类共有物包括空气、自来水、海洋、海岸。”该规定明确保护公众使用某些公共资源(海洋和海岸)进行捕鱼和自由航行的权利。公众对公共信托资源的权利为不受限制地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罗马法中公共信托原则被英国所接受,同时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的州和联邦案例不断丰富公共信托原则的内容,一方面,扩大公共资源的内涵,将用水保护纳入其中;另一方面,将政府容忍民众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利发展为积极保护。<sup>[5]</sup>

同美国相比,欧盟对自然资源损害诉讼主体的资格确定历经了重大转变。欧盟成员国多数是大陆法系国家,有较明显的公私法类型化倾向,针对不同的法律关系,进行分类救济。在环境法领域,污染环境破坏的是公共利益,在救济方式上并不适用于私法的救济,因此,2004 年《环境责任指令》前言解释部分第 14 项明确说明,“该指令不适用于个人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以及任何形式的经济损失,也不影响任何与之相关的权利。”<sup>[6]</sup>此条规定区分了环境领域的公益损害和私权损害,也由此消融了私人主体在环境损害中作为索赔主体的基础。该指令赋予公权力机构(public authority)在环境损害中的救济义务,这一条文改变了之前赋权公益组织针对环境损害提起诉讼的规定。依据欧盟委员会 2000 年制定的《环境责任白皮书》,公益团体可以就自然资源的损害对责任人提起赔偿诉讼,而 2004 年的《环境责任指令》则排除了公益团体直接向污染责任人提起诉讼的资格,变为由公权力机构作为受托人向损害责任人提起诉讼。<sup>[7]</sup>指令内容的这一变化,表现出对公私利益的分类救济,以及对公权力机构在公益事务中履职的要求和期待。前言第 15 项进一步解释,“由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是直接促进社区环境政策实施的任务,公权力机构应确保正确实施并执

行本指令所规定的制度。”该条表述直接解读了环境损害救济的公益属性,并将其与公权力机构的职责关联,为相关机构就环境损害采取进一步措施或提起诉讼提供了充分依据。公权力机构起诉污染责任人,不仅是一种权利,同时也表现为一种义务。该义务的执行,可以由公益团体来监督。对公权力机构的不作为,公益团体可以提起诉讼。Edward H. P. Brans 认为,欧盟指令采用的模式受到了美国《油污法 1990》的影响。<sup>[8]</sup> 美国和欧盟的相关规定显示出了由政府等权力机构作为受托人进行资源索赔的趋势。

(二)国家主张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与价值确定生态环境或自然资源的损失赔偿较难确定的原因具有多重性。首先,环境自然资源损害的赔偿对象具有争议性。James Peck 认为,赔偿是仅限于资源本身的损害,还是包括环境资源所能提供的生态功能的丧失,在不同国家存在不同认识。<sup>[9]</sup> 其次,由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以恢复资源为基础,恢复资源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不一样,恢复费用也不同,如何确定恢复手段的合理性和计算方法的科学性,较为困难。

关于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美国、欧盟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明确,如美国的《油污法 1990》、《超级基金法》(CERCLA),欧盟的《环境责任指令》以及各成员国的相关立法。综合来看,赔偿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生物多样性损害,包括受保护物种和自然栖息地的损害,赔偿目标是恢复受损生态系统的自然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第二,水体损害,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赔偿目标是恢复受损水体的水质和生态功能。第三,土壤损害,包括土壤污染和土壤侵蚀,赔偿目标是恢复土壤的生态功能和生产力。第四,自然资源损害,包括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的损害,赔偿目标是恢复受损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生态服务。第五,环境服务损害,即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的损害,赔偿目标是恢复受损环境服务的功能。

关于生态损害中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确定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市场价值评估法。即通过相应资源在市场交易中的价格,确定资源损害赔偿额。该方法的缺点在于,很多资源是没有市场价格的,比如有些国家保护的动植物资源,不能在市场交易,也就无法形成市场价格。第二,恢复和替代成本计算法。该方法用于计算受损资源的数量及恢复同样的资源所花费的成本,成本包括给定的资源

的全部价值及资源的受损程度。<sup>[9]</sup> 该评估法关注的是受损资源的稀缺性和供给的有限性。第三,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该方法通过调查或问卷的形式,询问调查对象对持续或重建某一环境或自然资源是否愿意支付价格,以此来确定该环境或自然资源的价值。美国《超级基金法》(CERCLA)和《油污法 1990》对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处理程序进行了规制。国家海洋气象管理局(NOAA)确定自然资源的损害。NOAA 评估程序和方法不采用 CVM 法,而是采取“资源对资源”“服务对服务”的方法。根据该方法,首先要设计恢复方案,使环境受损的服务功能可以由新的资源来补偿并提供类似服务。美国《油污法 1990》对自然资源的补偿采取不同的方法,根据该法 2706 条的规定,油污导致自然资源受损的案件,由联邦、州、印第安部族和外国政府受托人作为自然资源赔偿的评估人,评估人需要对损失进行评估,同时要制定并实施恢复、重建或用相近资源替代的方案。损失的计量标准包括以下内容:恢复、重建或取得和受损资源同等的自然资源的成本,在恢复期间自然资源减少的价值,对损失估算产生的合理费用。

## 二、域外普通民事主体对财产损害的求偿权

### (一)民事权利保护与双重赔偿的避免

在环境损害中,公益和私益损害交织,如何保证两者均得到救济,又避免重复赔偿(double recovery),是一个重要问题。在美国,自然资源损害方面的双重赔偿问题,一直是环境法和政策的关注焦点。双重赔偿是指两个以上索赔主体因同一环境损害获得赔偿而导致赔偿重复或过度。为防止双重赔偿,美国法律制度采纳了一些原则和机制。美国双重赔偿问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些重要环境法律的颁布,例如《清洁空气法》(1970 年)、《清洁水法》(1972 年)和《超级基金法》(CERCLA, 1980 年)。这些法律通过授权政府干预或允许私人诉讼,为因环境损害而受害的各方提供了赔偿框架。随着这些法律的完善,双重赔偿问题引起了关注,国家进而采用法律原则和机制来防止双重赔偿。首先,通过立法,明确禁止双重赔偿。一些环境法规,如《全面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法》,明确包含防止双重赔偿的条款,规定一方不得从多方获得相同的应对成本或损害赔偿。其次,通过司法实践行政干预损害赔偿分配。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可将部分损害赔偿划归政府,用于修

复公共资源,而将另一部分划归个人,用于赔偿其私有财产损失,以确保每个受影响的当事方在不重复的情况下获得适当的赔偿。法院在防止双重赔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仔细审查损害赔偿申请从而确保赔偿基于实际遭受的损害。如果法官认为会出现双重赔偿,可以减少或拒绝赔偿。

## (二)民事主体的索赔权利基础

关于一般民事主体能否在生态环境损害中行使求偿权,各国规定存在差别。根据侵权法的逻辑,有损害就应当有赔偿。一般民事主体在生态环境损害中只要有损失,就应当有求偿资格。实际上,多数国家授予自然人等一般民事主体求偿资格,但是请求权的基础并不相同。如欧盟的《环境责任指令》原则上禁止自然人和团体就自然资源损害提出赔偿,但是规定自然人可以基于财产的损害,依照成员国的国内法提起诉讼。<sup>[7]</sup> 欧盟立法规定自然人求偿的依据是财产损害。美国规定的自然人请求赔偿的前提更为宽泛,根据美国《油污法 1990》2702 条(b)的规定,公民可以因财产损失、生计损失和收入损失受到的侵害提出赔偿请求。相比欧盟,美国并不要求自然人必须有财产损失才能索赔,只要自然资源损害引起了收入损失,或形成生计上的困难,都可以提出赔偿请求。欧盟和美国的规定具有相似性,即自然人并不能直接就自然资源的损害要求赔偿。在美国,由相关政府机构作为自然资源受托人<sup>[8]</sup>,《油污法 1990》等法律将自然资源的赔偿请求权赋予了政府等受托人,就自然资源本体的损失进行索赔。而在自然资源之上的衍生经济利益的损害,则通过纯经济损失来进行赔偿。这一分类索赔的优点在于,一方面,尽可能避免双重索赔;另一方面,能充分保护受害自然人和团体的经济利益,使更多的因油污泄漏破坏生态环境而遭受经济损失的民众得到赔偿。在大规模环境损害中,民事主体损失的利益,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的民事主体的人身和财产损失,此类受害权利具有明显的私权属性,应当由民事主体直接进行索赔。第二类是由于资源损害引起的收入和生计的损失,其依据的自然资源或生态环境具有公益属性,但对于民事主体在主张纯经济损失和收益损害时,其与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的损失并不重叠,可以分开计量。该利益仍体现出私益性,应作为民事主体索赔的依据。由此,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损害中,民事主体仍然可以民法上的人身或财产权利作为请求权基础,主张赔偿,国家立法与司法应当予以保护。

## (三)普通民事主体的索赔范围

美国《油污法 1990》2702 条(b)(2)(E)规定了自然人因自然资源损害遭受损失时,可以提起索赔的范围。该类损失主要为收益和盈利能力损失:“任何人因个人财产、不动产或自然资源的损坏、毁灭、丧失而产生的收入损失和盈利能力的损害,可以主张该项赔偿。”该条规定被认为是索赔纯经济损失的依据。在《油污法 1990》出台之前,相关法律原则上对过失引起的纯经济损失不予赔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 Robins Dry Dock & Repair Co. v. Flint 案,在海事法中较早确立了这一原则,即过失侵权人只对财产损失承担责任,而对与财产损失相关的纯经济损失不承担责任。美国普通法中对侵权人因过失引起的纯经济损失也不主张承担责任。但《油污法 1990》更改了这一原则,其目的是希望更多的人得到损害补偿,特别是不享有渔业资源所有权而又直接受到损害的渔民以及受油污损害的海滨旅馆的经营人。《油污法 1990》的规定虽有利于保护受害人,但是由于没有规定索赔的限制条件,使求偿权利人过于宽泛,因此,有观点认为有必要对求偿人条件进行限制。Goldberg 主张通过资源使用权(use right)的标准来限制求偿资格,并指出油污损害造成纯经济损失的求偿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对环境资源有合法使用权,并且直接使用该资源的个人和团体;享有使用权的资源已经遭受污染;因资源污染遭受损失。<sup>[10]</sup>

## 三、我国现行大规模环境损害赔偿现状与完善建议

我国大规模环境损害赔偿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学习国际先进经验,逐步形成了区分救济的立法框架。现行法律体系力图对生态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求偿主体进行区分。首先,对于生态环境进行损害修复,《民法典》明确授权由国家机关行使。我国的法律制度与欧美国家存在差异,因此,国家行使索赔权的理论依据与欧美并不相同,我国的重要自然资源是国家所有制而不是美国的受托制,《民法典》沿袭了原《物权法》的规定,国家直接作为所有权主体享有海水和珍稀动物资源的所有权,而非基于受托人的身份。在原《物权法》颁布前,有的学者并不赞成自然资源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如梁慧星教授认为,无法特定化的物,既包括自然界的生成物,如海水和大气等,也包括人的制造物,如聚合物中的个别组成部分等,不能成为民法上的物。<sup>[11]</sup> 这部分学者

多为民法学者,他们的观点基于传统民法对于物的定义。环境法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吕忠梅教授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物权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物权融入了公法性,使得物权不再表现为纯粹的私权;另一方面,在环境生态保护的要求下,物不只是物理形态的有体物,还应该包括具备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双重属性的物,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物权,属于环境物权。我国《民法典》采纳了这一观点,将水、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作为物权的客体,设立相应的物权,使得环境资源的损害可以由物权主体主张赔偿。我国民法赋予自然人对某些自然资源享有益物权,从而使自然资源衍生出民事财产权利,此类自然资源损害必然形成民事权利的损害。其次,《民法典》等立法赋予了自然人因环境损害主张赔偿的权利。“侵权责任编”第1229~1233条规定了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以及被侵权人的索赔权,尽管对被侵权人并无明确的界定,但就民事主体的特点而言,自然人显然是其中应有之义。而《民事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赋予了特定社会组织对破坏生态、损害环境,造成社会公益损害的行为提起赔偿诉讼的权利。有关该特定社会组织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给予了进一步解释。《民法典》第329条规定:“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根据此条规定,公民可以在水域上设立包括养殖权和捕捞权在内的渔业权,渔业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具有财产属性。养殖权以一定的水域为客体,捕捞权的客体是渔业资源,因海洋油污对污染海域的渔业资源的损害,同时构成对渔民的渔业权的侵害。渔业权这类用益物权的损害,可以构成公民因生态环境损害提出求偿的基础。

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来看,自然人、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可以分别作为索赔主体,对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案件提起诉讼。然而,上述法律所规定的损害情形,在实践中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特别是在大规模环境污染损害案件中,污染损害行为除了侵害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由于损害的自然人数量众多,必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同时涉及大规模自然资源损害的,还需要对自然资源进行修复。如何请求赔偿,还需要立法予以细化。另外,在生态环境损害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证据获取困难。在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者往往面临证据难以获取的问题。例如,受害者需要证明污染行为

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这在许多情况下是非常困难的。此外,由于环境问题往往具有长期性和潜在性,一些损害可能在很长时间后才显现出来,这使得证据收集变得更加复杂。二是环境公益诉讼限制。虽然我国已经允许环保组织和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制,只有经过政府认定的环保组织才能提起诉讼,这限制了公益诉讼的范围和影响力。三是赔偿范围和金额问题。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在赔偿范围和金额方面的规定仍然存在不足,对生态修复的具体要求和赔偿金额的计算方法尚不明确,可能导致在实践中难以以为环境损害提供充分的赔偿。

在我国立法中应当进一步明确国家机关和普通民事主体在生态损害中的索赔对象和范围。《民法典》和生态环境损害司法解释规定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可以对自然资源的生态功能的恢复提出索赔。《民法典》同时规定对于自然资源的损害,可以由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主张赔偿。在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都有权利主张赔偿的情形下,二者在诉讼中的地位和关系顺位如何处理,尚无具体规定。国际上较为普遍的立法例,是由社会组织就环境损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益诉讼的本质是对主体不确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的损害进行索赔。根据《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在我国,国家对多数自然资源享有所有权,国家机关更适合代表国家作为权利主体主张损害赔偿。可以通过立法确定国家机关索赔处于优先顺位,即生态环境污染下自然资源的损害,由国家机关提出索赔。只有在国家机关怠于行使其索赔权的情形下,才由社会组织主张赔偿。这样既能促使国家机关履行职责,也能保证自然资源的损害不失于救济。《民法典》还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导致人身和财产权利受到损害的,自然人可以请求赔偿,但哪些内容属于财产权利,是否包括自然资源损害产生的收益的减少,该法并没有说明。可以通过立法将自然资源损害导致的经营收益和生计损失确定为普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益,自然人可以就此类损失提出赔偿,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明确受案范围,确定受案依据,对自然人等普通民事主体的权益给予充分保护。另外,在环境诉讼程序中,应当加强程序的优化。在环境污染的证明上,普通民事主体举证存在较大的困难,在举证责任上应当减少受害人的举证负担。在大规模环境污染中,可以借助高科技设备和手段,划定污染损失范围,建立初步的因果关系。受害人通过举证自己所处的受害区域,达到

初步举证标准。生态损害赔偿的具体标准和计算方法,应当以法律规范的形式予以明确。现行的生态损害赔偿的计量标准和依据,主要以技术规范的形式表现,缺乏权威性,因此,为确定计量标准、科学确定赔偿,在相关立法中,应当对计算方法和依据予以规定。

参考文献:

[1]渤海湾溢油案索赔案一审判决:养殖户索赔被法院驳回[EB/OL].[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97866](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97866).

[2]吕忠梅.环境公益诉讼辨析[J].法商研究,2008(6).

[3]Deborah G.Musiker,Tom France & Lisa A.Hallenbeck.The Public Trust and Parens Patriae Doctrines;Protecting Wildlife in Uncertain Times[J].Public Land L.Rev.,1995(87).

[4]John Arnold,Andrew Jacoby.Examining the Public Trust Doctrine Role in Conserving Natural Resources on Louisiana’s Public Lands [J].Tulane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2017(Summer).

[5]吴卫星.论自然资源公共信托原则及其启示[J].南京社会科学,2013(8).

[6]Allan Kanner.The Public Trust Doctrine,Parens Patriae,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as the Guardian of the State’s Natural Resources[J].Duke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Forum,2005(Fall).

[7]唐飞,李玲.欧盟环境责任制度的立法建构及借鉴意义[J].环境保护,2013(4).

[8]Edward H.P.Brans.Liability for Damage to Public Natural Resources under the 2004 EC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Directive;Standing and Assessment of Damages[J].Environment Law Review,2005(90).

[9]James Peck,Comment,Measuring Justice for Nature:Issues in Evaluating and Litigating Natural Resources Damages[J].Journal of Land Use & Environmental Law,1999(275).

[10]John C.P.Goldberg.Liability for Economic Los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eep Water Horizon Spill[J].Mississippi College Law Review,2012(335).

[11]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 Comparative Study on Differential Remedies for Massive Environmental Damages

Tang Fei      Wang Dingkun

(School of Law,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 434023,Hubei)

**Abstract:** In massive environmental damages,the de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vers the damage of multiple interests such as national,private and public interests.Subdividing different claimants and determining their respective claims basis can achieve adequate relief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It can be determined through legislation that the claim of state organs is in the first place,and only when the state organs are negligent in exercising the right to claim compensation,social organizations can claim compensation.The loss of operating income and livelihood caused by the loss of natural resources is determined as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rdinary civil subjects,and natural persons can claim compensation for this.

**Keywords:** massive environmental damages;ecological damages;private rights;differential remedies